

20 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

□ 葛剑雄¹ 安介生²

内容摘要 20 世纪的 100 年是中国移民通史的一个特殊时段。20 世纪的移民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呈现出十分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剖析与研究这个世纪移民运动特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对于中国移民通史的研究以及认识中国社会内在发展规律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 20 世纪 中国 移民运动 阶段性特征

作者 1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 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 100 年，是变化极为剧烈的 100 年。在这 100 年之中，中国先后经历了从专制帝制向共和制度的转变，又由共和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迈进，同时经历了地方军阀混战、漫长的国内战争与惨烈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浩劫”、改革开放等等重大历史变故。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变迁紧密呼应，20 世纪的移民运动呈现出十分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即每一个较长时段的人口迁移活动具有与前一时期迥然不同的特点。这种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是相当不寻常的，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在以往研究成果与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试图从宏观及总体上梳理及刻画出 20 世纪移民运动阶段性特征，审视与剖析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主导因素及社会历史背景，目的在于强调 20 世纪的移民运动在中国移民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重要研究价值，以推动对于中国移民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20 世纪前半期移民运动阶段性特征

20 世纪的前 50 年，中国社会经历的变迁与震荡古今罕见。封建王朝的最终崩溃、边地垦荒热潮的持续兴起、地方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国内战争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等重大事变，都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境内人民的生存状况及人口的分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事件。

一、清朝末年及民国初期的移民运动（1900 至 1930 年）：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清朝行将就木的时段，但是这个十年却是中国移民史上不可忽视的时期。随着边疆

全面放垦政策的实施，清代移民史的发展奏出了一段颇具震撼力的尾声。学术界通常认为：自 1902 年清朝正式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开垦蒙地的奏请起，蒙地放垦工作“由暗转明”，禁垦蒙地的政策被迫放弃，“走西口”也成为北方各省百姓光明正大的选择。而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之后，东三省移民活动也进入了全面开放时期，“闯关东”的人们从此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如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准并刊布的《沿边招垦章程》五章二十四条为标志，不仅官府从被动承认进入了主动招徕，而且移民招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自此也有了法律保障。这无疑大大激发起各地民众北迁黑土地的热忱，也使得东三省户口数量在短短数年内激增。据研究者估计，清代后期北疆的放垦，仅东北三省招徕的移民及其后裔总数高达 1344 万人，其中奉天省 500 万人，吉林与黑龙江合计 844 万人^[1]。而与此同时，向塞北蒙古地区的招垦政策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如据研究者估计，至 1912 年，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已超过了 400 万人^[2]。

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末鼓励移民实边的政策，推出一系列招垦及鼓励移民的法规条例，东三省地区依然是当时移民政务的重点，所制定的相关章程条例有：《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黑龙江清丈兼招垦章程》、《吉林全省放荒规则》、《绥远清理地亩章程》、《辽宁移民垦荒大纲》、《奉天试办山荒章程》等。以张作霖、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政府进而提出了《移民与开发计划》，并为此设置了移民局及东北招垦委员，这些积极的招垦措施对于移民运动无疑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3]。

当然，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东北移民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一部二十四史，

几无异于一部中国灾荒史（傅筑夫语），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38年的民国史，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4]与中国传统社会灾荒性移民运动相类似，残酷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与无法忍受的生存环境，最终迫使北方大批农民无奈逃离故土，将移民东北作为逃离灾难及开创新生活的希望，在这种状况下，移民东北实际上成为一种“逃荒之举”，如1930年出版的陈翰笙等人所著《难民的东北流亡》一书已开始对东北地区灾荒性移民进行系统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将向外移民作为纾解民困的有效方法，积极支持与协助移民外迁。种种主客观条件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的狂潮”，以至于《海关十年报告》（1921~1931）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5]。

可以说，从20世纪之初，直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中国境内发生的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的移民运动，无疑是向东北地区的移民运动。移出区域主要是河北、山东、河南及山西等华北诸省，尤以山东、河北两省移出人口最为众多。其次便是向内蒙古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来自山西及陕西等省份的百姓居多。

二、抗日战争期间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口移徙与调整（1931至1949年）：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以直接而野蛮的方式阻断了中国社会努力向前发展的脚步，也引发了一场在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涉及面极广的人口迁徙运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的移民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不仅众多有移民东北意愿的民众无法北上，而且出现大批逃难人口返迁回山海关以南地区的趋势。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侵略者首先进犯的目标。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在实际上引导了一场全国性的战略大转移。众多的沿海城乡居民、大批民族工业企业与高校随之西行，因而，在很短时间内，以重庆市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政治中心地带与人口高密度区。另据学者统计，除政府官员、学者及工商业者之外，抗战期间西迁的难民人数高达60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略弱^[6]。作为难民输出大省，仅浙江一省外迁的难民总数就超过了518万人^[7]。这不啻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绝大多数难民外迁以躲避战乱为主，既没有政府的整体规划与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迁移目的地与政府合理的安置救助，迁移过程等同于逃难，极其艰苦而凄惨，由此带来的人口损失极为惨痛。甚至在万般无奈之余，不少难民被迫在战乱之时选择返迁原籍。

另外，就东北地区而言，日本官方在强制阻止中国汉族移民迁往东北地区的同时，按步骤地实施了蓄谋已久的移民侵略计划，即所谓“国策移民”。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提出了20年间向中国东北移住日本农民100万户、500

万人的总体计划，而为了掩盖其侵略性质，日本政府将日本移民更名为“开拓民”，将移民侵略政策称为“开拓政策”，并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据统计，以吉林省为例，自1935年至1943年吉林20个市县迁入的日本农业移民就达8200户，23885人^[8]。大批日本开拓民迁入东北地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伤害。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全境进入了一个人口的全面恢复与调整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回迁南京，大批西迁的工厂、院校及避难的民众也逐步返回故土，真正留居下来的西迁人口较难统计，但可以肯定只是原来西迁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同样，迁居于东北地区日本移民绝大多数被分批返回日本。

20世纪后半期移民运动特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政治事件。但是，经过多年国内战争的破坏，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中开始了国民经济与国防事业的恢复与建设。加强国防实力、保障新兴国家独立与完整，与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同样是新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因此，实行计划经济，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掌控有限的资源成为经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央政府往往采取全国统筹安排的方式对人口问题进行处理，政治主导性的特征极为突出。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现代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大优势与最大资本，因此，最有效地调整劳动力资源，就成为1949年以后影响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建构与布局变化的极为关键的一环。

一、建国初期经济性与国防性移民运动时期（1949至1959年）：

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摆在新政权面前的第一要务是巩固新兴政权与保持稳定，因此，人口政策与移民行动也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军事与政治性的人口迁徙在这一时期的比重是相当突出的。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地区统治的覆灭以及退守台湾，引起了一场复杂而影响深远的移民运动。移民台湾，即国民党政权机构官员及其军队、眷属、随从人员向台湾地区迁徙，是这一时期移民运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支。综合台湾官方历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学者们推定从1945年台湾光复至解放战争结束后的数年内，大陆迁台人口至少应在100万人以上^[9]。不过输出地情况较为复杂，据研究者估计，仅浙江一省就有17万人以上迁往台湾^[10]。

新时期移民运动与新中国的政治、边防与国民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新疆地区的移民问题颇具代表性。如新疆地区解放初期，部队转业屯垦戍边，形成了进

入这一地区数量最大的迁移人口。1952年,进驻新疆的解放军与整编后的新疆民族军(其中大多为新疆本地居民)集体转业成为工程建设部队,1952年总人口达273229人,1954年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这些特殊移民为了新疆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国防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11]。1953至1958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中国大陆地区开始从战后调整时期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封锁,更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新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极为有效地调动起广大人民投入国家建设的热情,服从祖国建设的需要,建设型的移民运动此起彼伏,成为新时代移民运动的主旋律。与经济建设相关或为满足劳动力需求而实施的移民数量迅速增加,影响巨大。人口的输出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输出,更是生产技术与文化资源的输出。如作为全国最大的老工业基地,上海市责无旁贷地承担了繁重的支援外省市经济建设的任务。据相关统计,仅从1950至1957年,上海为支援其他省份建设迁出的人口就超过43万人,主要迁往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西北各地^[12]。

由于大批外来建设性移民的到来,许多西部省份的人口在建国初期迅速增加。以宁夏为例,据统计,自1950至1957年的8年中,迁入的外来人口超过了62万人^[13]。又如山西省煤炭资源丰富,探明储量居全国各省区之最,故有“煤海”之称。为将山西建设成为能源基地与机械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调入大批外省市管理及技术人员、职工等,大型工矿业基地所在地往往成为外来移民集中区域。如从1950至1960年,山西省净迁入人口就超过了125万人^[14]。江西省是南方地区人口数量变化较大的区域之一,从1954~1957年,江西每年人口总迁移量都高达100~200万人,1956年净迁入量竟达10万人以上,而这些移民大都是为了支援江西的经济建设而来^[15]。水库移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出现的一种新型移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些水患频发地区,没有水库的建造,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经济发展就缺乏保障。但是,水库建设过程中,往往有必要将淹没地区人口迁出,重新安置。于是水库移民就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移民类型。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报告估计,中国自1950至1999年水库移民数量高达1220万人,而自1950至1959年的第一个10年的水库移民就有460万人,是水库移民数量最多,迁移也最集中且最频繁的一个阶段^[16]。如浙江地区的新安江与富春江水库建设之初,就制定出移民32.3万人的计划,然而在外迁过程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转迁及回流现象,最终经过协调,其中10万人迁入了江西省^[17]。位于河南省境内的著

名的三门峡水库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项目,淹没区涉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移民数量则超过了42.1万人,其中陕西省28.7万人,河南省7.1万人,山西省6.3万人。移民外迁涉及问题非常复杂,安置工作相当棘手。三门峡移民妥善安置持续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1997年的统计数字,因三门峡水库修建而引发的三省移民数量实际超过了60万人^[18]。

众所周知,时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虚夸风气,在移民政策上也出现了操之过急过快的倾向。如中央政府提出从国内人口密集的江苏、安徽、湖北与上海等省市向新疆移民200万人的计划,据估算,自1957年至1960年,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迁入新疆的移民就超过了80万人^[19]。又如中央政府当时发出了动员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如在浙江省于1956年与1960年两年之内,先后动员了两批共97453名青年及其家属迁往宁夏地区^[20]。与此同时,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大批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在中国城镇经济不甚发达,物质供给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这种过于匆忙、不合理的移民行动,造成了严峻的经济困难与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也就是6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人口大规模调整的客观背景。

二、“三年困难”时期及“文革”时期的人口调整与波动(1960至1979年):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与社会面临严峻的困难,这种困难迫使原来不合理的移民政策与状况发生了急剧的调整。当时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移民类型便是以精简城镇人口为目的的移民运动,其目的就在于减轻国家对于供养城镇人口所需的商品粮供应及其他财政负担^[21]。据统计,从1961至1967年,浙江全省共有100余万人迁离城镇^[22]。据估算,自1959至1965年,河南一省迁出人口总量达到275万人,成为人口变动最为剧烈的省份之一^[23]。在60年代,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斗争背景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三线”的建设规划(即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一线,西北与西南为一线),重点加强西北与西南地区建设。而为了加强这些相对边远地区的发展,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调入大量来自东部省区的干部、技术人才、职工及其家属。如四川等西南地区被视为中国的大后方,也成为“三线建设”工程的重点,如从1965至1971年,从省外向四川迁入大批工厂、科研单位与大专院校,净迁入人口达到53万人,其中随迁职工人数就达到40万人^[24]。为有效改变中国经济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中央政府继续着手有步骤地将沿海地区的企业向西部转移,如青海便是主要的转移地之一,在“三五”至“四五”期间,青海省迁入的外地职工及家属就有12万人。然而,对青海地区实施的数次大规模移民垦荒活动最终以种种原因以失败而告终^[25]。

由“上山下乡运动”引发的人口迁徙影响更为广泛,

但出于强烈的政策性干预与时代局限，其最终的移民成果相当有限。为了缓解城市就业问题以及改变农村落后状况的需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批生活在城镇的青年进入本省或其他省份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知识青年迁出地集中于各地大、中、小城市及城镇，而迁入地则涉及成千上万的各地乡村。如据统计，1968至1976年，上海市共迁出了60余万名知识青年^[26]。又如首都北京地区干部下放劳动与“上山下乡”运动相交织，从1966至1975年净迁出人口超过了40万人^[27]。而在60年代，山西是接受外省市知识青年较多的省份，其中包括4万多名北京青年，7000多名天津青年^[28]。在此同时，各省省内的知识青年迁移数量则更为庞大，福建省在60年代与70年代下放的知识青年超过了36万人^[29]。大批外来青年的迁入，往往是在迁入地政府与百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不仅大大增加了迁入地政府与民众的负担，同时，对于大批知识青年来讲，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无法继续求学求知，长期从事简单而原始的农业生产劳动，也均成为无法接受的现实状况。正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弊端与现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种迁徙活动最终的全面失败。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人口迁徙特征(1980至2000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口发展又进入了一个重大调整与发展时期。就调整而言，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迁当时成为一种明显时代特征的现象，绝大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原籍。而在短时期内，如此庞大的人口涌入城镇之中，必然造成城镇地区居民生活、人员就业及物资供给等多方面的严重问题。

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必须突破原来僵化的理念与管理机制，同时，现代经济需要大批劳动力，而农村劳动效益低下，于是，大批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参加建设，便成为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征，“农民工”、“外来务工者”等等的称谓流行一时，表现出新时期人口迁徙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大陆居民前往国外学习、工作以至定居打开了大门，“出国潮”与“打工潮”一起成为中国新时期人口迁移中最具特色的两种类型^[30]。改革开放以来，由一些著名的大型水库建设而引发的人口迁移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如以三峡水库建设的影响最为突出，涉及的移民总数就达到了113万人^[31]。为了给百万移民安置与生活提供保障，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均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并非常注重将迁移安置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如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于1992年4月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国务院于1993年8月就颁布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修改后的条例于2001年初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自当年3月1日起施行。而在该条例中正式提出了“开发性移民方针”，对于妥善安置新时期的水库移民具

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32]。

新时期中国大陆地区人口迁移显示出十分突出的空间特征。如据研究者分析，就省际迁移而言，自1985至1990年的5年间，中国人口迁移存在了6个人口吸引中心与5个人口迁出中心。6个吸引移民中心分别是广东、江苏、河北、辽宁、上海与四川，5个迁出中心为四川、黑龙江、河北、江苏和甘肃。其中，四川、江苏、河北三省既是移民迁入中心，又是主要的移民迁出地。可见，改革开放后实际的人口迁移迁出与迁入互相交织，具体情形是相当复杂的^[33]。移民发生的空间特征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密切相关，如有研究者指出：三大都市圈（即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来人口迁徙的主要流向也是三大都市圈，三大都市圈的迁移流量占全国总迁移量的40%以上^[34]。

还应指出的是，时至20世纪的最后5年（1995—2000），中国大陆地区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扩张，达到3398.12万人，年平均规模大约为679.6万人，形成了研究者所称的“井喷现象”，奏响了新时期人口迁移浪潮的最强音^[35]。大量的迁移人口一方面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对城乡发展、环境资源以及人口分布的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几点思考

20世纪是中国移民历史的极不寻常的时段，20世纪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剧烈变化的历史、中华民族备受磨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古老民族重新走上崛起之路的历史。而20世纪剧烈而复杂的社会变化，直接影响及决定了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运动的阶段性特征，政治事变、自然灾害、战争冲突、经济建设等等都引发了人口的大规模迁徙。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历史，移民运动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之间高度的相关性与互动性，非常引人注目。探讨20世纪移民史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必须较全面地揭示与分析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影响与造就20世纪中国移民史阶段性特征的历史与地理背景是相当复杂的。概言之，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关键的：

首先是政治体制变迁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影响因素。在一个世纪之内，中国从极度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专制社会，转变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其间所经历的政治、社会变革是非常惊人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人口是一种基本的、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因此，任何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都会引发人口的相应波动。如就政治转型而言，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专制王朝向一个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这一过程是相当困难与艰辛的，其中免不了歧路、弯路甚至是教训、失败。20 世纪的前 50 年，中国社会几乎是在血雨腥风的磨难中度过的，而 20 世纪的后 50 年，不明智的政治决策与频繁而严酷的政治运动又几度让整个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口迁移活动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身不由己的亿万中国民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其次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因素。纵观 20 世纪的 100 年，积贫积弱的中国必然寻求经济崛起，于是乎，求强求富成为一个落后民族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无疑是中国数千年民生史最凝练的总结：“穷了几千年了，是（追求富强的）时候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强有力的支撑，而人口分布的不均衡不可能满足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因此，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自发的或有组织的移民运动可谓此起彼伏。20 世纪前半叶，向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潮，是大批移民要求改变经济状况的自愿选择，而经济因素对于移民运动的推动力在 20 世纪后 50 年更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过程的最重要的表象之一，便是大量农民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及周边区域的聚集与转移。

最后是自然环境（包括自然灾害）及地理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及移民运动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这种状况在 20 世纪前半叶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外徙逃生成为众多灾民的无奈选择，自然灾害甚至成为人口重新分布的主要助推力之一。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即使是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与防灾减灾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之后，严重自然灾害对于中国人口及移民发展的影响与威胁也是不容低估的，60 年代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困难便是极为典型的例证之一。同时，地域差异与发展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主要障碍之一。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 世纪中国人口研究”（编号为 06JJD84003）资助成果]

参考文献：

- [1]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95-505.
- [2] 闫天灵. 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4.
- [3] 范立君. 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7-92.
- [4] [5] 夏明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 北京：中华书局，2000：5、91.
- [6] 孙艳魁. 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3；苏智良等编著. 去大后

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62.

- [7] 张根福. 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
- [8] 王胜今. 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1-72.
- [9] 陈永山、陈碧笙主编. 中国人口·台湾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64.
- [10] [17] [20] [22] 王嗣均主编. 中国人口·浙江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149、151、150、152.
- [11] [19] 周崇经主编. 中国人口·新疆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39、140-141.
- [12] [26] 胡焕庸主编. 中国人口·上海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40、146.
- [13] 常乃光主编. 中国人口·宁夏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134.
- [14] [28] 毕士林主编. 中国人口·山西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42、143.
- [15] 马巨贤、石渊主编. 中国人口·江西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36-139.
- [16] [18] [32] 雷亨顺主编. 中国三峡移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60、64-65、161-168.
- [21] 罗平汉. 大迁徙——1961~1963 年的城镇人口精简.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 [23] 貂琦主编. 中国人口·河南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42.
- [24] 刘洪康主编. 中国人口·四川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155-156.
- [25] 翟松天主编. 中国人口·青海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1-190.
- [27] 李慕真主编. 中国人口·北京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47.
- [29] 傅祖德、陈佳源主编. 中国人口·福建分册.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40.
- [30] [35] 王桂新等. 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35-50、65-66.
- [31] 李伯宁、殷之轲. 库区移民安置.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2.
- [33] 阎蓓. 新时期中国人口迁移.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95.
- [34] 俞路. 新时期中国国内移民分布研究.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54.

编辑 秦维宪